

# 别了！海德格尔：追寻主体的生命

——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状况<sup>①</sup>

刘 哲

从 18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一百多年间，德国哲学在整个世界的哲学理论界始终居于中心位置。在此期间，德国的哲学思考不断引领着世界其它各个地方哲学的理论发展方向。如果考虑二战之后英美分析哲学对于先前德国哲学理论的批评性回应，我们或许不妨可以把德国哲学视为欧陆哲学传统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至少是最重要的代表之一。由于特殊的历史接受原因，在汉语学界，当人们提及欧陆哲学传统的时候，往往首先考虑到的就是德国哲学传统。

然而，如果仅仅把德国哲学，尤其是当代德国哲学局限在所谓的欧陆哲学传统中，并使“当代欧陆哲学”与所谓的“英美分析哲学传统”相对立的话，那么我们将既无法理解德国哲学自身的历史理论资源，也无法理解其当代的各种理论发展形态。在这里，请首先允许我对“当代欧陆哲学”这个概念的含混性做一个初步的澄清。以此澄清为基础，我们将试图建立这篇关于

---

<sup>①</sup> 这篇综述最初是 2008 年在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基地为北京大学教育部人文研究基地会议上所做报告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是关于法国当代哲学发展的，已经发表于 2012 年《外国哲学》第二十二辑中。与法国部分的报告性质相同，这份综述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德国哲学发展背景的描述来引介一些当代德国哲学的出版物。因为是从原来报告整体中节选出来的一部分，所以笔者对于当代德国哲学研究状况这一部分做了少量语言方面的修改和注释部分的增加。主要的叙述主题没有任何变化。

德国当代哲学状况之论述所依赖的体系性和理论性的问题视域。

首先让我们从一个相对容易处理的含混性开始。这个含混性与“欧陆”这个限制性要素相关。事实上,被我们标签化了的所谓的“欧陆哲学”来自于一个无法被辩护的对立模式。在上个世纪中,我们通常含混地把欧陆哲学与英美分析哲学对立起来,并将它们视为两个不同的哲学传统。在汉语学界,谈及欧陆哲学,人们会自然地联想到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和其它种种时髦的思想潮流;而谈及英美分析哲学,人们则会联想到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语言分析以及其它种种严格的哲学运动。然而,这个二分对立的哲学传统无论在历史、地理、哲学论题以及哲学方法上都无法被合法化。<sup>①</sup>在哲学理论关系中,所有这些哲学运动及思潮都可以或近或远地溯源到康德哲学在现代思想世界中所带来的变革。而就这些哲学流派的地理以及历史渊源而言,所有这些现代哲学流派都起源于中欧(德国和奥地利)德语哲学世界中。按照这样的分析,谈论所谓的欧陆哲学传统事实上是语词的错误使用。

尽管如此,没有人会否认在上个世纪欧洲大陆与分析哲学的哲学发展中,无论是在思潮、运动还是风格意义上,它们各自形成了独特鲜明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或许我们可以谈论所谓的欧陆哲学。可是根据我们上面的讨论,似乎很难以定义的方式在本质上建立所谓欧陆哲学和英美分析哲学的二元划分。把这两个同样有价值的要素综合起来,我们愿意给出一个尝试性的、或许更加贴切的表述:在欧洲大陆的哲学。当代德国哲学正是在欧洲大陆的最重要哲学理论发展形态之一。

其次,我们所要讨论对象的含混性还涉及到“哲学”这个核心要素。在上个世纪中,我们在欧洲大陆那里的哲学发展中看到了层出不穷的理论思潮和流派,它们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在从事着理性的思考。甚至在居于主流的一些思想流派中,例如法国的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德国法兰克福学

---

<sup>①</sup> 关于这些区分角度的批评性论述,参见 Hans-Johann Glock, *What is Analytic Philosop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派，哲学家们对于哲学的任务也有着完全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规定。人们甚至会质疑：在多大程度上他们可以彼此承认对方的理论工作具备哲学工作的性质？如果关于哲学理论性质纷争的这个事实可以被承认，那么我们就根本无法从任何一个流派或思潮的具体命题或教义出发来概括在过去的年代中所发生的思想的事情，并把它们冠名为哲学。

最后，我们还必须面对的一个含混性与时间的界定相关。具体而言，我们需要理解在怎样的历史划分中我们可以确立所谓的“当代”的界限。纵然我们把当代哲学在欧洲大陆的发展追溯到上个世纪现象学初始期的胡塞尔那里显得过于迁远，但是似乎没有人可以准确地指出多近的时间段可以被界定为当代。而且如果我们考虑到在欧洲的两个主要哲学国度中——德国与法国的哲学发展进程并不彼此一致，我们就更无法宽泛地给出一个关于当代的具体历史划分。基于这样的困难，我们根本无法借助物理性时间的划分来界定所谓的“当代”。

如果我们仔细思考最后这两个含混性，不难看出它们彼此之间存在一种相关性。一方面，不同思想潮流的更迭与历史时间的线性流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既然我们无法从任何一个时间点划分当代与过去，我们就无法通过历史发生顺序来罗列在一定时间段中所出现的各种思潮，并用它们的总和来概括当代哲学在欧洲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也无法以任何一种思潮作为历史进程所最终要指向的目的或根源，并以此为基础来确定所谓的当代。否则，每一种理论主张都可以使用自身的理论资源来建立所谓的当代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独特的当代概念，它既可以化身为某个具体的理论视角，又可以容纳各个视角之间的历史更迭。出于有限的空间，我们无法通过哲学的论证来辩护这样的当代概念。在此，我们仅限于指出这样的当代概念只能是通过一个基本的哲学理论问题来被界定的。

在关于法国哲学状况的报告部分中，我们曾经借用当代重要的现象学家 Rudolf Bernet 的书名“主体的生命”来界定当代法国哲学中的基础问题域。我们将在后面看到，这个相同的基础问题域同样属于当代德国哲学。

不仅如此,在当代德国哲学的发展进程中,“主体的生命”这个基础问题域的形成最终也同样依赖对于海德格尔哲学基本理论方向的告别。在这个意义上,“别了!海德格尔”这个极具情绪性的表述丧失了自己的感情色彩,转而成为对于一个具体问题域和有限理论视角的历史性刻画。<sup>①</sup> 具体而言,本篇报告试图展示:任何想探讨理性本质及其条件的哲学思考很难从海德格尔的哲学作品中找到充分的理论资源。

这里需要再次提醒:我们对于 Bernet 的借用并不意味着他自己的理论著作成为了当下德国哲学冲突和争论的中心,尽管没有人会否认他在现象学研究领域中理论工作的重要性。“主体的生命”这个基础论题域不仅包括对于主体主义和客体主义理论模型的拒绝,而且更是对于人类理性本质最小可能条件的探索。正是在对于主体理性生命的反思促动下,当代德国哲学不断通过与经典文本和当下研究的对话,形成了各种不同的理论方向。

在进入我们的具体论述之前,我们想再次强调这篇综述的一个方法论假设。人们往往期待一篇历史性综述文献是对于所谓的客观历史事实的复述。然而,这个方法论期待依赖于一个无法证明的素朴实在论的形而上学假设。与这个形而上学假设相对应的是同样无法被证明的、类似于神性全知视角式的知识论假设。出于对这双重形而上学和知识论假设的否定,我们在此强调我们所依赖的“主体的生命”这个问题域所具有的视角性。然而,这个视角的获得不是一种主观的独断。相反,它既依赖我自身研究的理论背景,也依赖一些最重要在世德国哲学家们对于自身理论进程所做的回顾和分析。在后面的讨论中,我们将会清楚地看到这些德国哲学家对于我的思考的具体启发与影响。

---

<sup>①</sup>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我们必须提及的事实是:海德格尔在汉语思想界的接受与在德国哲学界战后的短暂接受出发点迥异。因此,在这篇报告中,“别了!海德格尔”这个标题必须受到德国理论语境的约束,不具有任何普遍性的含义;或者说,它更是对于本篇报告视角有限性的强调!毕竟,存在着这样的逻辑可能,对于海德格尔的接受无关于反思理性本质及其条件这个具体的问题域。

## 一、告别海德格尔

在上个世纪 60 年代，德国哲学界曾经经历过一段海德格尔哲学的主控期。然而，我们很快将看到，德国哲学界对于海德格尔思想的这次短暂接受与二战后的法国哲学界的接受有着完全不同的初衷。<sup>①</sup>

在德国，战争的惨痛经历使得人们在战后对于法权(Recht)问题格外关注。<sup>②</sup> 战后德国哲学家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为法权概念以及与法权紧密相关的政治机构——国家——概念提供哲学理论基础。根据 Henrich 的回顾，在战后第一时期发挥作用的哲学理论思考来自康德主义以及天主教经院传统的法权理论。在这个时期，尽管哲学家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理论任务，并且试图重新激活法权理论传统，但是他们所提供的思想内容却既无力也无助。他们无法提供一种具有广阔视角的全新理论模型，因而无法应对当时德国以及整个世界的局势。

由于这样的理论缺失，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二战后的德国哲学过渡到自己的第二个发展时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开始主导性地影响德国哲学界。根据 Henrich 的分析，值得一提的是，海德格尔这时的影响与他在 20 年代通过《存在与时间》造成的影响方式完全不同。他自己后来承认《存在与时间》是一部无法被完成的著作，而且他的思考走向的是另外一条路。1950 年，海德格尔出版了一部新的哲学作品《林中路》。他的这部著作与其它一些论文迎合了当时德国整个理论界的一种感

---

① 关于二战后法国哲学界对于海德格尔的复杂接受，参考：刘哲：“别了！海德格尔：法国哲学视角”，载《外国哲学》，第二十二辑，第 339 - 347 页。

② 根据 Dieter Henrich 的分析，所谓的德国“战后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战后结束初期，第二阶段是 50 年代，第三阶段则是 50 年代中后期到 60 年代，而第四个时期则始于 60 年代末。参考：D. Henrich，“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nach zwei Weltkriegen”，收于其论文集 *Konzepte: Essays zur Philosophie in der Zeit*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7)，第 44 - 65 页。在这篇综述中，我们下面关于战后德国哲学发展阶段的基本命题和主要标记性描述来自 Henrich 的这份文献。

受:过去所有伟大的哲学理论都被证明是既无力也无关。另外,根据 Henrich 的阐释,海德格尔试图在其后期的哲学作品中展示一种全新的思考可能性以及必要性:这种全新的哲学思考不是以过去的理论为基础来进行的重新尝试,而是与之截然不同的探索方向。海德格尔的这种理论倾向在 Henrich 看来依赖他独特的历史发展模型。具体而言,海德格尔认为从古希腊哲学思考到近代的主体性理论根本不是朝向本原的努力,而是一条遗忘本原的道路。由此,海德格尔反对近代哲学以来不断回溯和追问理论假设的努力。他认为我们只能承认这些假设本身并且在其与本原的关系中思考它们。根据海德格尔以遗忘为模型的历史理论,在哲学理论的发展进程中,原本发生的还没有被把握就再次被卷入到其后面的结果中了。海德格尔的后期哲学理论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拒斥以往的哲学思考传统,并由此得以在当时的德国哲学界变得迷人。它试图言说在过去没有被思考的内容,而且与不断被重复的过去相对立。

根据 Henrich 的描述,海德格尔后期思想在战后德国的影响展示在如下三个主要方面。首先,尽管海德格尔的哲学与哲学理论传统极端对立,但它仍然可以与过去的理论历史发生关联;只是它把过去看成一个在现在终结的整体。海德格尔对待传统的这种思想方式恰恰辩护了德国哲学界怀疑后黑格尔哲学的合法性。其次,海德格尔的思考一方面让人们赢得解决问题的耐心,另一方面合法化摆脱消费社会的生活形式。最后,在分析哲学影响来到德国之前,海德格尔就理论的语言条件提供了自己的哲学洞见。海德格尔的理论目标在于理解各种假设,从而准备一种不可控制的转向;在这样的转向中,人们能够通过返回本源来赢得与当代的距离。根据 Henrich,在海德格尔的影响下,德国知识界出现了众多的历史思想家,他们探讨如何可以准备一种与世界更加本原的关联,这个关联异于现代技术、异于现代物理学,甚至异于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神学家们则讨论基督经验是否可以在海德格尔理论中为自己找到新的位置。艺术解释则发展出一种全新的展示文本和作品的方法。这种解释超越了传统美学的界限。在 Henrich 看来,

伽达默尔 1960 年出版的《真理与方法》一书，正是海德格尔学派同类型文献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出版物。

在 Henrich 看来，海德格尔哲学在德国的影响力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开始消退了。根据 Henrich 的分析，海德格尔哲学战后影响的短暂性主要基于以下三点理论原因。首先，海德格尔的思考造成对于现代世界的消极拒绝。它并不要求改变这个世界，因为在遗忘的道路上任何改变只能发生在这同一个遗忘本原的世界内部。相反，它要求回到一种仅仅停留于思想层面的、反思技术世界根源的简单生活。这样，尽管人们不可能否定这个世界的事实存在，但是却可以否定其从未被质问过的统治合法性。其次，海德格尔对于传统哲学语言的拒斥导致其自身哲学语言的困难。海德格尔造成的语言困难不仅使得任何翻译变得不可能，而且与德语直接冲突。毕竟德语很长时间以来受到具有理性精神的拉丁语的影响。最后，海德格尔在没有任何实质理由的前提下，把他对于现代性的批评与一种远离城市生活的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与此同时，Henrich 指出，导致海德格尔哲学影响消退的现实原因还有二战后德国以及整个世界生活方式的变化——国界打开、对于现代语言和国家理论认识的迅速增长、人口的流动、国际化以及其它现代世界作品的影响。基于这些理论和现实的理由，海德格尔学派首先在德国的大学里受到了强烈抵制。

根据上述 Henrich 的描述和分析，海德格尔战后影响的出现和消退背后其实都来自战争经历所带来的哲学困惑。以一种悖论性方式来刻画，我们不妨指出：战前海德格尔哲学以一种不可被接受的方式回应了当时德国社会生活中的生命困惑。这样，在德国哲学界出现了一个实质性的理论任务：告别海德格尔！一方面，这个告别是要重新解释哲学传统，以便可以匹敌海德格尔通过遗忘道路来摧毁传统的解释。另一方面，在德国哲学界，这个告别试图通过对于近代哲学传统的重新解读和其它哲学传统的引入来批评和纠正海德格尔自己哲学中的理论缺陷。正是在历史性和体系性双重任务的规定下，德国战后哲学开始了第三以及第四个发展阶段。这两个阶段

或者从历史维度或者从理论维度开始反思理性和意识这两个基本概念。在这个意义上,在德国哲学界,告别海德格尔意味着是对于主体、主体性乃至主体生命的重新追问。

## 二、重新发掘德国哲学传统

根据上面的论述,我们已经看到海德格尔曾经于20世纪50年代短暂地统治着战后的德国哲学界。随着他哲学影响力的逐步消退,德国哲学家一方面必须继续面对战后德国社会生活中关于法权的基础理论问题;另一方面在对海德格尔的批评中建立关于哲学传统的全新解释,从而匹敌他的遗忘解构。根据 Henrich,海德格尔对于哲学传统的解构是其最为重要的理论结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战后德国哲学开始了自己的第三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特征在于其鲜明的历史导向,而且获得关注的是近代哲学中最为重要的哲学体系构建。这里需要提及的首先是康德、黑格尔、费希特的晚期哲学以及胡塞尔现象学。

根据 Henrich 的分析,这些后康德哲学体系并没有因为康德式的批判而被彻底终结;另外,它们与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各不相同。<sup>①</sup> 在德国哲学界,康德与黑格尔的哲学始终具有影响力。胡塞尔的现象学也依然存在并远播到世界其它地方。只有费希特的后期哲学是一个重新发现。海德格尔未经其老师胡塞尔的认可便批评并摆脱了后者的现象学理论。关于费希特和黑格尔,海德格尔只有一些非常肤浅的接触。尽管他对于康德哲学有着天才般地解读,但是其康德解释的根本特征在于丧失康德批判哲学的主要意图。<sup>②</sup>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德国哲学界试图通过重新解释近代德国哲

<sup>①</sup> 参见 D. Henrich, "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nach zwei Weltkriegen", *op. cit.*, s. 50 ff.

<sup>②</sup> 关于海德格尔对于康德哲学根本洞见的丢失,参见 D. Henrich, "Über die Einheit der Subjektivität", 载 *Philosophische Rundschau* (3), 1955, pp. 28 - 69.

学传统中最为关键性哲学家的理论成果，从而摆脱由海德格尔理论所带来的各种缺陷。这就意味着要提供一个比海德格尔的解构性解释更为周全和更令人满意的历史文本解释。像我们上面已经提到的，这种全新的解释一方面要彻底超过海德格尔的哲学解释工作；另一方面这个超出同时能够带来对于海德格尔自身哲学理论缺陷的批评与矫正。根据 Henrich 的观察，这个时期的哲学历史研究工作首先使得黑格尔与胡塞尔哲学理论的解释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标准。

在借助历史文本解释告别海德格尔的背景下，德国哲学界在这个时期开始大规模编辑德国哲学传统中经典哲学家文本的历史-批判版全集工作。由狄尔泰在 19 世纪就已经开始的康德全集编辑工作在这个时期中得以继续。莱布尼茨全集的编纂工作虽然早在 1901 年就已经开始，但由于受到二战和战后德国分裂等政治因素影响，始终无法得到更多进展。<sup>①</sup> 在这个时期开始的还有由 Reinhard Lauth 带领开始的费希特全集的编纂工作，以及由 Otto Pöggeler 带领开始的黑格尔全集的编纂工作。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1939 年胡塞尔档案馆于其逝世后不久在比利时鲁汶大学建立。胡塞尔全集从 1950 年开始出版。从 1958 年开始，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系列丛书 (Phenomenologica) 开始出版。<sup>②</sup> 这些历史-批判版全集的出版，至今仍在不断地影响着人们对于这些德国重要哲学家的接受与研究。

除此而外，我们必须提到的还有 Henrich 本人在去除海德格尔影响以及复兴德国古典哲学中所做的决定性理论贡献。Henrich 不仅在康德哲学研究中做出了影响深远的理论工作，而且在德国唯心论哲学（费希特、荷尔德林、黑格尔以及谢林）研究中和德国唯心论哲学前史（莱茵霍尔德、狄辞

---

① 莱布尼茨全集编纂历史情况的简要说明，参见 <http://www.leibniz-edition.de/Geschichte/>

② 胡塞尔档案馆的简明历史，参见 <http://www.hiw.kuleuven.ac.be/hiw/eng/husserl/ehus1his.php>

以及雅各比)研究中均做出了开创性和具有持续影响性的研究工作。另外,他的理论影响也在英美哲学界留下了很深的痕迹。他的许多相关的重要研究论文,甚至包括上个世纪7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的讲课稿,都被结集成英语文集出版了。<sup>①</sup>毋庸置疑,对于理性与意识这两个哲学传统论题的探索构成了 Henrich 历史性与理论性研究的核心关注点。

Henrich 本人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历史性和理论性研究不仅局限在战后德国哲学的第三个阶段,而且延伸至今。为此,我们不得不在此暂时中断战后哲学的阶段划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 Henrich 开始在德国科研基金会(DFG)支持和资助下主持“耶拿计划”(Jena-Projekt),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所谓的“星群式研究”。<sup>②</sup>这个星群式研究是对于德国古典哲学起源时期的思想家星群进行微观的和起源式的历史研究。这个方向上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有 Henrich 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关于荷尔德林哲学的著作《意识的基础》,另一部是关于狄辞哲学的《从我来奠基》。<sup>③</sup>其次有受 Henrich 研究方法深刻影响的洪堡大学教授 Horstmann 的著作《理性的所有边界》。<sup>④</sup>最后还有图宾根大学教授 Frank 关于早期浪漫派的研究《“无限的接近”》。<sup>⑤</sup>同样受 Henrich 的影响,但后来发展出来的德国古典哲学研究模型更加具有分析特征。这个新的研究方向放弃了对于哲学家单一个体的研究模式,转而关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各个思想家之间的论证性和体系性

---

① D. Henrich, *Aesthetic Judgment and the Moral Image of the World*,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The Unity of Reas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The Course of Remembrance and Other Essays on Höderli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以及 *Between Kant and Heg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参见 D. Henrich, *Konstellationen*,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1.

③ 参见 D. Henrich, *Der Grund im Bewußtsein*, Stuttgart: Klett-Cotta, 1992 以及 *Grundlegung aus dem Ich*, Frankfurt a. Main: Suhrkamp, 2004.

④ 参见 R. -P. Horstmann, *Die Grenzen der Vernunft*, Frankfurt a. M.: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1.

⑤ 参见 M. Frank, “Unendliche Annäherung”, Frankfurt a. Main: Suhrkamp, 1997.

对话关系。在这个方向上的研究成果有哈勒大学教授 Stolzenberg 的研究以及由其建立的会议论文集系列。在这个系列下已经出版的成果有《康德与早期唯心论》。<sup>①</sup> 在这个工作方向上除了 Stolzenberg 以外，我们还要提到的有波鸿大学黑格尔档案馆主任 Walter Jaeschke，以及波鸿大学教授 Birgit Sandkaulen 和维也纳大学教授 Violetta Waibel。<sup>②</sup> 在今天的德国哲学界，Henrich 和他的众多学生们所开创的全新研究模型构成了对于德国古典哲学传统进行重新解读的第一起点。在这些重量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于荷尔德林、诺瓦利斯以及德国浪漫派哲学理论的研究也辐射并影响到德语世界的文学理论研究。而且这个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

### 三、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对话

战后德国哲学对于英美分析哲学的引入同样由告别海德格尔这样的—一个基本理论视角所规定。战后德国哲学第三阶段的历史性研究工作帮助人们重新赢得了独立思考的可能，并且避免了海德格尔式向着本原过度还原的路向。在战后德国哲学的第四阶段，对于英美分析哲学的引入则与一个更加直接的理论性问题关联在一起——到底什么是理性以及什么是意识？

根据 Henrich 的分析，战后德国哲学界引入分析哲学的契机与海德格尔的一个语言命题紧密关联：只要人们使用传统语言，就无法澄清该语言所

<sup>①</sup> J. Stolzenberg, *Kant und der Frühidealismus*, Hamburg: Meiner, 2007.

<sup>②</sup> W. Jaeschke, *Die Vernunft in der Religion*, Stuttgart: Frommann-Holzboog, 1986, 以及他所编辑的系列丛书: *Der Streit um die Romantik (1820 - 1854)* (Hamburg: Meiner, 1999), *Der Streit um die Göttlichen Dinge (1799 - 1812)* (Hamburg: Meiner, 1999), *Der Streit um die Gestalt einer Ersten Philosophie (1799 - 1807)* (Hamburg: Meiner, 1999), *Der Streit um die Grundlagen der Ästhetik (1795 - 1805)* (Hamburg: Meiner, 1995), B. Sandkaulen, *Grund und Ursache*, München: Fink, 2000, 以及 V. Waibel, *Hölderlin und Fichte 1794 - 1800*, Paderborn: Schöningh, 2000.

蕴含的各种理论假设。因此,任何以传统哲学命题为导向的理论模型要想使自身合法化,就必须找到一个独立于其自身的表达基础与表达形式。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诉求下,德国哲学界对于分析哲学的兴趣迅速增长起来。在 Henrich 看来,与 G. E. Moore 的哲学理论目标相反,战后德国哲学界对于分析哲学的引进不是为了摆脱传统哲学问题,而是为了展开和解决这些问题来寻求并使用逻辑学与语义学理论。与此同时,分析哲学自身的内部发展也使得与传统哲学问题的对话变得更加容易实现。一方面分析哲学逐步放弃了在形而上学方向上设定的严格限制;另一方面它所谓的心灵哲学的发展也需要与传统先验哲学进行对话。

根据 Henrich 的描述,在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对话中,战后德国哲学界形成了两个新的理论流派:一个是以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为导向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而另一个则是在爱尔兰根教授 Paul Lorenzen 身边形成的操作性语义学理论。<sup>①</sup>

在 Henrich 看来,尽管法兰克福学派起源于 20 世纪 30 年代,但其真正的理论进展则是由哈贝马斯完成的。哈贝马斯接受了美国实用主义的认识理论和社会心理学,并由此发展出关于当代研究认识方法的批判性理论。他试图证明以物理学为导向的经验科学的分析方法和人文科学中发展的理解方法彼此互相依赖。为了彻底澄清这两种方法的区分性和依赖性,哈贝马斯的理论把它们奠基在社会行动理论基础之上。只有当这两种研究类型总是意识到自身与社会行动之间的关联并且把自身理解为建立自由的媒介,这两种方法才能避免沦落成为反对理性的力量。到 20 世纪 7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已经可以在政治生活中造就与海德格尔相比肩的影响力。

与法兰克福学派处于同一阶段的哲学流派是由操作主义理论家 Lorenzen

---

<sup>①</sup> 由于笔者有限的学识,下面三段关于法兰克福学派以及操作主义理论的哲学概括完全来自 Henrich 的论文:“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nach zwei Weltkriegen”, *op. cit.*, pp. 55 - 57.

及其学生们构成的。根据 Henrich 的刻画,这个学派不仅通过语词的使用语境来解释各个语词的意义,它尤其关注在传统中与真值相关的理性话语领域。他们试图证明这种关涉真值的理性语言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行动的有意义结果。与哈贝马斯一样,这个学派同样把行动作为哲学理论证明的最终维度。然而,与哈贝马斯不同,Lorenzen 的行动概念原则上是符号性活动。正因此,对于 Lorenzen 操作主义理论而言,如果理性要认识自身,它还必须考虑在对话条件之外的很多其它基础性条件。

根据 Henrich 的分析,随着法兰克福学派在政治领域中影响力的建立,德国以希特勒统治经验和国家分裂为背景的战后哲学结束了自己的发展过程。战后的德国哲学由此重新确保了法权的理论基础、重新确保了哲学历史传统而且重新开始对世界开放。

#### 四、结语

现在,让我们来结束对于战后德国哲学发展的历史描述。根据我们上面的分析,战后德国哲学植根于战争引发的个体法权和国家理论方面的现实社会生活困境。面对这样的生活困难,德国的哲学理论界不是试图重新设计一套全新的社会政治运作模式,而是试图在哲学理论上去解释和辩护个体法权。海德格尔哲学在战后德国的短暂接受和最终被弃都源于面对人类理性生活困境时的理论匮乏。正是通过告别海德格尔对于哲学理论传统的解构以及其自身返回本源的理论主张,德国哲学界得以重新通过理性和意识这两个重要哲学概念来分析和把握自己面对的理论 and 现实困境。无论是以 Henrich 及其学生关于德国哲学传统所进行的历史、理论研究,还是哈贝马斯和 Lorenzen 通过引入分析哲学传统所建立起来的新型哲学理论,他们都试图回应个体法权问题及其背后所预设的理性或者说主体的生命这个基本问题域。

毫无疑问,主体的生命这个根本问题域所蕴含的哲学问题远远没有获得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域的开放性已经伴随着德国哲学同近代哲学传统和

当代分析哲学的理论对话被建立起来。在这个意义上,主体的生命界定了当代德国哲学的当代性根源。在战后德国哲学界,短暂接受海德格尔本身正是对于这个规定德国哲学当代性之问题域的展示;而告别海德格尔则是真正开启这个问题域的前提。<sup>①</sup>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

<sup>①</sup> 在这篇综述报告中,笔者有意识地将 Dieter Henrich 的工作与反对海德格尔哲学的理论背景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来自与 Jürgen Stolzenberg 先生的一次有趣交谈。在此,对于 Stolzenberg 先生提供的历史信息和建议表示感谢。当然,文章中的所有错误和缺陷由笔者本人承担。